

高考移民增多的思考

据《华夏时报》近日报道，人们对国内高考制度和大学教育水平的不满在逐年增加，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选择送孩子出国留学，甚至举家移民。

文章中用采访对象的话来指出大学教育质量的下降：“国内的大学生在大学里能学到什么呢？中国大学扩招之后，教育投入和教学质量却没有同步增长，很多学生考上了自己不喜欢的专业，也得照样去念大学。他们一天到晚混日子，老师对此也是漠不关心，讲完课就完事大吉。”相比之下，国外的教育制度则很灵活和人性化，“国外大多数大学不仅有换专业、转学的自由，对教学质量要求也很高。”当然，也有其他因素，如国内高考是独木桥竞争，而国外申请则相对容易。

高考移民并非很美满的事，亲人要忍受离别的痛苦，孩

子要忍受孤独寂寞的煎熬，家庭要省吃俭用甚至变卖房产来筹措国外高额的学费和生活费。其间的辛酸苦楚他人是难以体会的。然而，尽管如此，高考移民还是越来越多，家长说“如果国内可以公平高考，大学教学质量也很好，谁愿意让孩子去异国他乡？一半以上的考生考上的都不是自己喜欢的专业，但也无法换专业和转学，读这样的大学意义何在？”

近些年来，国内高等教育有了大的发展，大学的科研成就也一样在发展，发表论文的数量剧增，这些都值得肯定。但是作为大学教育的对象，并不理睬这些辉煌的成果，却在用脚投票，干脆去外国上大学。尽管能够有经济条件出国的高中毕业生占考生的比例很小，但是这一现象依然值得我国高等教育界深思。

年终专稿

2012高等教育十大关键词(下)

■本报记者 温才妃

关键词六：高校公共设施开放

3月初，北京34所高校宣布将逐步向社会免费开放图书馆。4月，18家北京高校联合宣布将陆续免费向社会开放所在高校的博物馆。一时间，高校公共设施开放成为媒体、公众热议的话题。

实际上，不只是北京，黑龙江、辽宁、江西、湖北等多地高校图书馆或博物馆均有开放行为。

一项“高校图书馆是否该向公众全面开放”的调查显示，有75.99%的人选择“应该”。高校没有独占书籍资源的权力，公众应该从高校图书馆中广泛获益。

公众的诉求固然合理，但在高校人士眼中，却有贻笑大方的意味。因为全面放开，不仅空间资源紧张、管理措施无法跟上，还很可能重蹈公共图书馆对外开放的覆辙——成为无关人士夏天纳凉、冬天取暖的好去处。

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在强调开放的同时，很可能忽略了真实需求。毕竟高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的定位有着天然区别，前者多偏重研究者需求，后者强调大众口味。

与图书馆相比，博物馆向公众免费开放则是大势所趋。但要求的条件并不少，如确保贵重文物的安全，保证人员配备，强化设施建设等等。

有如此多难以一时解决的问题，当前的高校公共设施开放，还是止步于有条件的开放为好。若一味“跟风”冒进，甚至将公共设施开放当做行政摊派的任务，无疑会给高校、公众带来更多麻烦。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与其聚焦于高校公共设施开放，不如考虑用什么方式把公众吸引到就近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里来。

关键词七：南科大“转正”

从2007年深圳市政府决定筹建南方科技大学，到今年4月教育部公布《教育部关于同意建立南方科技大学的通知》，南科大从“出生”到“转正”历时5年。这也意味着，南科大的身份由民办转为公办。

两年前，在没有教育部招生许可下，校长朱清时组建“自主招生”培训班时，发出“南科大迈出一小步，将是我国高教改革的一大步”的话语依稀在耳。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并询问南科大的改革。

继去年，深圳市委发布公选副校长、3名参与筹建的教授退出合作、学生发博文退学等事件。今年5月，南科大公布的招生方案，又为他人所诟病。该招生方案取消了建校初“考生可以不用参加高考”的条件，改为高考成绩占60%的录取模式，且被安排在提前批招生。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如今的南科大在本科办学层次失去了“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可能。比起首届45名学生发表公开信拒绝参加高考，校方的改革充满遗憾。

妥协是否是南科大转正的“筹码”，外界无从知道。可就在今年两会期间，朱清时表示：

清华EMBA十年来首次推出全新课程体系
管理教育无须“制造者导向”

■本报记者 陈彬

不久前，在清华校园里，一位授课老师上完一门题为“清华探究”的课程后，收到了学生发给他的一条短信。短信上说，“清华探究”是一门极其好的课程，这不是他的结论，而是同学的共识。

粗看这门博得学生喝彩的课程题目，很多人可能以为这是清华新开的一门选修课，实则不然。这其实是清华新推出的EMBA课程新体系中，很有分量的一堂课。与这门课程同时诞生的，还有一系列新的课程和新的理念。

繁荣背后的隐忧

中国的EMBA教育出现于2002年，至今整整10个年头。这期间，该项目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今年10月，英国《金融时报》公布了2012年的全球EMBA项目排名，13家中国商学院的项目进入百强。在前10名的EMBA项目中，有3项来自内地商学院，清华与欧洲工商管理学院联合举办的EMBA国际项目更是名列全球第四。这样的成绩在绝大多数国内学科的世界排名中都是见不到的。

应该说，这样的数据反映了中国EMBA教育的良好一面。但在另一方面，10年间世界经济格局和中国企业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但EMBA教育的课程体系却没有跟得上形势，这引起了一些人士的思考。

“今年我们针对EMBA的课程，先后召开

了10次研讨会。”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说，在讨论中他们发现，清华以及中国其他首批开办EMBA教育高校的课程体系大多基于当时的MBA课程体系。但事实上，EMBA学生与MBA学生有很大不同。MBA的学生平均年龄30岁左右，而EMBA则是40岁出头；前者的定位是培养未来领导者，而EMBA学生多数已经是领导者。所以EMBA学生需要的是思考宏观问题，而不能停留在技术层面。

“我们也曾参考过国外商学院EMBA课程，但发现其课程与MBA并无二致，参考价值不大。所以我们必须创新，设计出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新课程体系。”钱颖一说。

新体系的“中国味道”

仅仅在名称上看，清华经管学院推出的课程体系就很“中国味道”。

据介绍，清华EMBA新课程体系主体分为四大模块，即“天”、“地”、“人”、“通”，其中“天”是指企业的宏观经营环境，“地”是指企业经营管理之道；“人”是指领导者的领导力；“通”要达到的境界是“会通”，即领导者要达到古今会通、中西会通、文理会通、商工会通。

“清华EMBA希望营造的企业和企业领导者的新的境界就是知晓‘天时’、把握‘地利’、创造‘人和’、会通‘八方’。”钱颖一说。

“清华探究”便是“通”模块中的一门课程，

主讲老师、清华大学史研究学者黄延复已年逾八旬，在清华校园工作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在授课中，黄延复将带领学生游走校园，通过对人物、历史、轶事的讲解，让学生从另一个角度了解清华，了解中国近代历史。

在学分方面，国家规定的EMBA学位必须完成32学分，清华EMBA设计了至少22学分的必修课，除此之外的10学分选修课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任意选择。

“在管理学上，有一个‘制造者导向’理论。通俗地说，就是我能制造些什么，我就想引导消费者买什么。但在管理人才的教育上，我们定然不能有这样的导向，而是应首先认清我们的学生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真正需要什么，再由此安排自己的课程。而此次推出的新课程体系便是这样诞生的。”清华经管学院党委书记杨斌如是说。

把工作做到授课之前

近期，经常有关于国内某些机构EMBA教育的新闻出现在报端，引起公众对EMBA教育的质疑。钱颖一并没有作任何评论，只是简单地表示，扎实地做好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工作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怎样做才算是扎实呢？

据了解，此次新课程体系的推出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清华经管学院制定的“清华EMBA

创新发展2012计划”中的核心一环。除此之外，整个计划还包括招生推广、教学手段、校友活动、后EMBA项目以及国际项目等诸多配套措施。每一个措施背后，都凝聚着制定者的深思熟虑。

仅以新课程体系教学中的师资配备为例。据介绍，新课程体系的教师由3部分组成：清华经管学院教师、清华其他院系教师以及校外的专家学者，其中云集了一大批知名学者，而在这些教师的考核上，清华便选择了一种很“扎实”的方式。

“对老师讲课水平的考核多为课后考核，虽然能发现老师的不足，但由于课已经上完，很难补救。因此，我们要把工作做到课前。”钱颖一说，学院在开设一门新课之前，会请来数十位资深校友担任“荣誉评审”，授课教师要在他们面前将课程全部讲授一遍，荣誉评审当场指出其不足，如果问题太多甚至可以要求更换教师。

钱颖一曾亲身经历了“清华探究”课程前期评审。最终，那些带领学生讲解校园的老师因为讲解不够细致，被荣誉评审否定——这才有了黄延复的“出山”，才有了学生对课程体系的信心满满：“我相信新体系不仅为清华EMBA输入了新的活力，也会对中国EMBA教育有所推动和引领，这也是我们所最为希望的。”

中国大学评论

高校食堂价格
“洼地”意义何在

■卢晓东

2012年12月初，北京天然气价格每立方米涨了0.23元，调整后价格为2.28元/立方米。

天然气是北京地区采暖的主要能源，也是高校食堂做饭的主要能源。天然气价格的上涨会导致食堂饭菜价格上涨。比如，馒头、包子的价格应该上涨，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早已经被大众普遍接受。但实际情况是，高校食堂主要饭菜的价格继续维持原位不动，高校需要继续消化天然气价格的上涨。

这些洋大学享有一流的师资、特色的课程设置、科学的管理模式，在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留学生输出国的环境下，中国学生能够就近入学有“海外名校血统”的洋大学无疑是好的。

与此同时，更多的人则是期望洋大学发挥“鲶鱼效应”，刺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然而，中外合作办学与知名大学海外分校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纳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系，考生无法同时拿着洋大学与内地高校的通知书加以选择；后者则在招生、培养、管理、学位授予等方面与母校保持一致。这是洋大学进入中国的“先天不足”。

要想发挥洋大学的“鲶鱼效应”，就不得不考察中外合作高校双边的融合与互动。当前，人们为洋大学“人乡随俗”所担忧，一些洋大学未能吸收西方大学的教育理念、办学经验，反倒被中国应试教育中的考级、考证所同化。如果缺乏质量上的保证，这样的洋大学还有增设的必要吗？

关键词十：办学自主权

10月12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的出台给我国高校带来欣喜。根据新规定，除了国家控制点的62种专业、尚未列入目录的新专业，其余444种专业高校可以自主设置，不再需要教育主管部门审批。

面对着这项有限的“失而复得”的权力，我们不免还要问一个问题——中国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怎么了？

依据《高等教育法》的规定，高校享有系科招生比例调整权、学科专业设置权、教学权、科研开发和社会服务权、国际交流合作权、机构设置和人事权、财产管理和使用权等7项办学自主权。

长期以来，7项办学自主权既没有进一步划分子项属性，也没有相应的实施细则。高校听命于行政，办学自主权“形同虚设”，出现了“中国高校像政府、像企业，唯独不像高校”的局面。

事实上，用行政规律代替教育规律，也是千校一面、创新型人才缺失的根源所在。而归还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要义是界定政府与高校的权力关系。譬如，大学校长能否不再是行政任命，能否打破5年的任期？大学里应该重视的是教授，还是官员？近年来，在这些问题上，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亦有突破。

事实上，用行政规律代替教育规律，也是千校一面、创新型人才缺失的根源所在。而归还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要义是界定政府与高校的权力关系。譬如，大学校长能否不再是行政任命，能否打破5年的任期？大学里应该重视的是教授，还是官员？近年来，在这些问题上，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亦有突破。

然而，在没有界定权力的前提下，尽管高校在拟定大学章程、提高学术委员会的地位，我们仍不得不承认，中国离真正的高校自主办学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从教育财政角度分析，高校食堂价格“洼地”实际是对高校食堂补贴的结果。补贴的来源大致有两个，一是来自高校获得的生均财政拨款，二是来自专项针对食堂的价格补贴。据《中国教育报》2012年10月1日头版报道，北京市级财政自2012~2013学年起，按在校本科生、研究生每学年150元的标准对学校予以补助，同时要求高校按每年不低于150元计提，作为平抑资金中的学校部分。这样针对学生食堂的补助就达到了每生每年300元。

《中国教育报》在头版报道此事，应当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有号召其他省市学习之意。这果然是一件好事吗？我们这里需要认真探讨，针对高校食堂的补贴其目的和意义何在呢？或者说，高校食堂价格“洼地”意义何在呢？

讨论之前，我们需要对财政补贴的来源有一个共识，无论是高校获得的生均财政拨款，还是如北京市一般性针对食堂的专项补贴，都来自于纳税人的税收。因而我们的问题可以转变为，纳税人为什么要为高校学生吃饭纳税？考虑税收成本的存在（比如税务局）和财政管理成本的存在（比如财政局），北京市纳税人为300元的财政拨款，保守估计至少缴纳了400元税款。这样的税款会为纳税人带来什么呢？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在其《教育的经济价值》一书中提出，学校教育过程所消耗的资源要素包括教师、图书馆工作人员和学校行政管理人员等的服务成本，维持学校运行耗费的要素成本，以及学校房屋、土地等的折旧、陈废及利息成本；但不能包括与教育服务无关的附属活动成本，如学生食堂、住宿、运动队活动等项成本，也不包括向学生提供的奖学金、补助等“转移支付”性质的支出。这里“与教育服务无关的附属活动成本”就是杂项成本，学生的餐饮成本就是一项杂项成本。餐饮成本与学校教育成本相比，其本质差别在于：教育成本进入教育过程，产生教育效果；而餐饮成本不进入教育过程，不产生教育效果。这也就是说，学生在学校吃饭，本质上是不产生教育效果的，学生因其情况不同，在家里吃饭、在学校食堂吃饭、在学校之外的餐馆吃饭，教育效果不会有差别。这当然符合常识，没有家长和学生选择大学是因为该大学的饭菜便宜。

高等教育是能够带来社会效益和私人收益的准公共产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收益的各方来负担成本才合理。对于并不带来教育效果、因而也不带来社会效益的餐饮成本，让纳税人分担部分成本并不合理。“很少有人拥护对学生食宿作高额补贴的做法。”因此，作为餐饮成本活动单独受益者的个人，就应当以餐费负担全部餐饮成本。考虑学生家长也是纳税人，考虑税收成本的存在，如果存在结构性减税的可能，这样的政策本质上对所有纳税人都是有益的，也最终对每个学生有益。

因而，我们的结论就非常清晰了，针对高校食堂的专项补贴在本质上是无意义的，至少其意义值得认真反思和争辩。通过补贴形成高校食堂价格“洼地”也没有意义，这种补贴引发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北京、四川等地高校不断出现的餐饮问题即是明证。在日益完善的市场经济背景下，正确的政策应当是逐步取消针对高校食堂的补贴，使高校餐饮价格逐步与市场接轨（考虑规模效益和高校食堂不盈利的特点，其价格会略低于周边市场）。同时，在高校已经非常完善的困难学生资助系统基础上，增加对困难学生的补助。

美国教育经济学家约瑟夫·施蒂格利茨在其著作中也指出：“学生生活大部分成本，如住宿、饮食、书籍和交通开销，应该在以学生家庭收入状况为基础提供助学金的条件下，由学生或其家长承担，而不应该全面依赖政府或纳税人的直接或间接补助。与通过学费实现教学成本补偿方式相比，将生活成本从由政府承担转变为由学生和其家长承担是一种更重要的转变形式。”